



正义事业锻造的友谊万古长青

——纪念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七十周年

Evergreen Friendship Forged in a Righteous Cause --- 70 Years in Retrospect of the Yan'an Tour by the 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

鲍世修,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大校, 高级研究员 (SrCo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retired, senior researcher)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1944年7月22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军事观察组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 来到延安。观察组一行的使命, 是了解日军在华北和东北的基本情况、作战特点和我军的政治、军事情况, 研究将来在中国作战的各种可能, 同时利用我边区有利的地理位置为美海军提供作战用气象等情报。观察组此行还有一个隐含目的, 这就是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及未来地缘政治战略布局探路。¹ 观察组分两批到达, 共18人, 先后在延安地区留住两年多, 最后一名成员于1947

年3月11日乘美国C-47运输机撤出。在此期间, 中国抗日的正义力量在盟国的支持下, 彻底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 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地区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根据地军队及民众的互动和互相了解, 也锤炼了中美两国军人之间、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并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上绘就了相互依赖、友好合作的重要篇章。

一、国内外战场的有利形势

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之所以得以成行, 当时国内外的战场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图1: 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穿着东道主赠送的中山装合影留念

就国际范围来说，1944年的欧洲战场形势一片大好，苏联军队对德军的攻势十分强劲，步步逼近侵略国本土。与此同时，美、英等国联军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出第二战场。德、意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彻底溃败已成定局。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情况稍有不同。日本侵略军尽管面临盟国联军的巨大攻势压力，但仍保存有一定的作战力量。美国对日宣战之后，美国政府视中国为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加大了对华援助的力度。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整体表现，令美国政府很是失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中国敌后战场坚定对日作战，不断重创日军，共产党在整个中华抗战中的地位引起了盟国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失时机地彻底摧毁日军的最后顽抗，减少自身军队的损失，缩短整个战争的进程，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从其当前和未来战略布局出发，开始慎重考虑与纪

律严明坚定抗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而时任中缅印战区外交官的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及时向罗斯福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遂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戴维斯的这份备忘录就说服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列举了6点理由，如下：

这一切，已然清楚。在共产党管辖的中国地区：(1) 这里是在日本最大军事集群地和第二大工业圈以内及附近开展对日军事行动的立足之地；(2) 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里可以向我们提供有关日敌的最大量情报；(3) 这里有一个最团结、最严明、最勇敢的抗日政权；(4) 这个政权是对蒋介石政府的独一无二的最大挑战；(5) 苏联如果进攻日本将从这里进入；(6) 这里将是新中国和苏联政权接近的奠基之地。²



图2：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下半旗致哀。

就中国国内的形势来说，国民党为了不让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日寇侵略斗争中进一步扩大影响，一直限制舆论媒体对之进行报道，更不用说让外国军事人员访问延安。但1944年的夏天，情况却有些不大一样。中国战场的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对其限制稍微放松。

1944年1月，日军拟定“一号作战纲要”，发起侵华以来较大规模的一次战略进攻。而对日军有计划的掠夺攻势，国民党军队却未做认真抵抗的准备。河南战役打响后，许昌和临汝相继陷落。5月25日，洛阳被占。6月18日，日军攻占长沙。至此，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已丧失信心。7月7日，罗斯福甚至致电蒋介石，提出由美国将军史迪威指挥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推说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并提出：与美方“军事之彻底合作，必须以政治合作为基础。”这个政治合作，明眼人都知道，是指蒋介石说了多年却从未拿出诚意的对中共之合作。

然而此时，蒋介石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都陷于被动局面，加上6月18日来华造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不得不勉强同意了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的安排。后来，毛泽东在欢迎使团到来的宴会上风趣地对美国客人说：“你看你们是多么重要！为了让你们到来，连美国副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做说服工作。”³

二、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

那么，中国共产党方面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来访又是怎么样看待和对待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毛泽东对中国

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想法。

1939年1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文本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单单为了保卫一个民族的生存，而且是为了维护东方的安宁和世界的和平而进行的战争。它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要消灭共同的敌人，就必须联合一切为正义而战的国际朋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重要军事策略思想，早在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作过清楚表述。他说：“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⁵

毛泽东相信，外援，包括美国的对华援助，对中国抗战的胜利至关重要，他清楚地指出：中国的抗战离不开外援。在1939年1月，他就明确表示：“在伟大抗战中，基本地依靠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我们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⁶

毛泽东的所有这些言论集中说明了一个观点，即中国的抗战同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必须联合一切可争取到的进步力量共同对付强敌。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1944年夏，延安迎来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外交举措非常重视，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有很大的意义。6月29日，他主持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观察组来延安问题，并作出决定：向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作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

为了做好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周恩来还专门为此草拟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44年8月18日下发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指示》要求大家把对外国记者和美国人员的接待，作为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切实做好，作为将要走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岗位的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外交工作认真做好。

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后，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人先后多次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8月23日，毛泽东还亲自同“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美方称谓）两位政治官员之一、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的约翰·谢伟思（John S. Service）进行了一次内容丰富的长时间谈话。在这之后，直到1945年8月16日使团被正式撤回先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中美双方人员有了更多的广泛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建立了难以忘怀的战时情谊。

按照规定，观察组须定时地向美国政府发去他们关于中国敌后边区各方面的所见所

闻。正是由于观察组许多成员的如实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军政素质、战斗能力和抗敌业绩等，才得以按其本来面貌，而不是经过国民党某些部门过滤、甚至歪曲后成为戴维斯备忘录中所称的“二手”信息，呈现到美国国家最高决策人的面前。⁷这对加深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军民抗击日寇入侵的战场上举足轻重地位的认识，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三、战时情谊弥足珍惜

美国军事观察组人员在履行“迪克西使团”使命的过程中，深入我各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同我广大抗日军民大量直接接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实实在在的抗日战争和敌后边区建设，渐渐有了清楚背景认识。对抗日斗争的残酷性和艰苦性，他们也感同身受，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5年4月21日，观察组的惠特尔赛申尉（1st Lieutenant Henry S. Whittlesey）在太行山的榆社县堡下村遭日寇杀害，从此便长眠在这远离家乡的土地上。战争时期，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血与火的洗礼，锤炼了两国军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纯真友谊。而在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战时共同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对那段生活所具认识价值的深入思考，便成了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两国人民间真诚友谊的真正动力。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美国朋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Captain John G. Colling）青年时代在中国生活过，接触过中国文化，又精通汉语，并对抗日战争背景有一定了解。在执行“迪克西使团”任务期间，他深入到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了解中国军民

边浴血抗战边建设家园的真实情景，并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伟大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信念：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军民合作抗日，是美国在亚太战场赢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选择。

他的回忆录《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一书，通过记述他本人和他同事们参加军事观察组的亲身经历，展现了中美交往史上许多十分珍贵的场面，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革命圣地延安的精神风貌。由于这本书以确凿的事实检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所以为书做序的美国知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指出：“约翰·高林拯救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一卷失去的篇章。这卷篇章本来可以改写当代的历史，使美国在亚洲避免两次失败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因而，“这本书值得美国政策制订者和美国公民仔细阅读。”⁸广大读者从索尔兹伯里这些话中不难看出约翰·高林这本著作所包含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

约翰·谢伟思是“迪克西使团”中又一位毕生致力于美中友好事业的知名人士。他曾向自己政府提出过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政策主张，并预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在中国全国取得胜利。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他备受歧视，横遭迫害，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却从未减退。雨过天晴后，他先后6次偕夫人一起访华。1984年，为了重温战争年代在延安听过的关于长征的故事，谢伟思还陪同索尔兹伯里千里迢迢重走了一次长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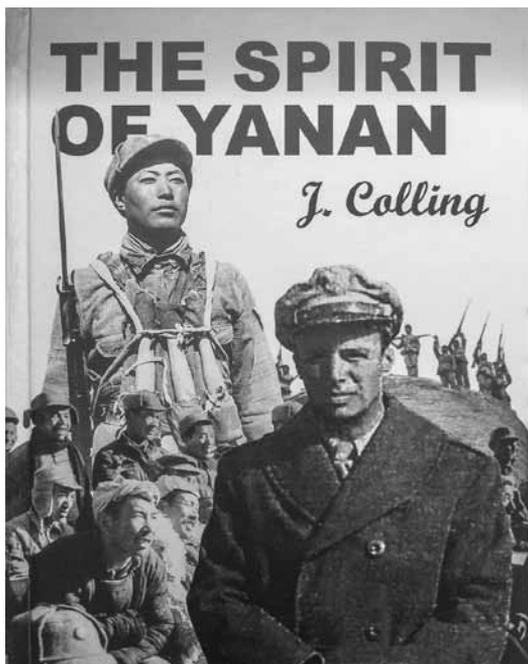


图3：约翰·高林回忆录《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

当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民抗敌御侮正义事业的美国好心人，远不止军事观察组范围内的各位朋友。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一位，是埃文斯·福·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在抗日战争中，他冒着炮火，深入到我华北敌后根据地，在枪林弹雨中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甘共苦。⁹卡尔逊后来写了《中国的双星》（The Twin Stars of China）等著作，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敬重之情。美国对日本宣战后，他遵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组织了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参照八路军的作战经验，袭击日军占领的多个岛屿，获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为太平洋上的抗日作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日本投降后，卡尔逊组织了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在争取美国实行进步的对华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贡献。

除了上面提到的高林、谢伟思和卡尔逊三位先生之外，迪克西使团的其他许多人士都怀着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同情。对他们，以及广大美国友人在中国抗战期间和之后提供的真诚帮助和支持，中国民众将永远铭记心间，将这作为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

研究历史，是为铭记，为鉴今，为知远——何况这段历史并不遥远。从美国政府派出迪

克西使团到现在，中美关系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最困难的考验。如何消弭误解，看清世界发展的逻辑走向，正需要像高林、谢伟思、卡尔逊等人的大量有识之士，在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发展友谊，锻造互信，避免冲突。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背道而驰，中美两国并肩作战流血牺牲得来的和平，才能长久延续下去。祝正义事业锻造的友谊万古长青！♣

注释：

1. 参看 John Paton Davies' memo to president Roosevelt [戴维斯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http://en.wikipedia.org/wiki/Dixie_Mission.
2. 原件下载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JPDmemo.jpg>，原文是：“This much, however, seems clear. In Communist China, there is: (1) a bas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nd near Japan's largest military concentration and second largest industrial base, (2) perhaps the most abundant supply of intelligence on the Japanese enemy available to us anywhere, (3) the most cohesive, disciplined and aggressively anti-Japanese regime in China, (4) the greatest single challenge in China to the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5) the area which Russia will enter if it attacks Japan, and (6) the foundation for a rapprochement between a new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3. 约翰·高林，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英文版见 John Colling, "The Spirit of Yanan---A wartime Chapter of Sino-American Friendship" [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1), Chap. 1, 16.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页。
5.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页。
7. 见注释1。
8. 见注释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高林此书作序的英文原文如下：“John Colling has rescued a lost chapter in American policy in China, one which might have changed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spared the country two lost wars in Asia --- the Korean and Vietna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1), xxiii.
9. 中国八一电影制片厂近年拍摄了“共和国将领”历史系列影片，其中，《孔庆德生死护送卡尔逊》提供了一些相关情节。



鲍世修，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大校（1950年11月入伍，1990年9月退役），军事思想专业高级研究员，资深军事翻译家，曾任军事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熟悉英、俄、德语，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经典作家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经典作家著作的译校和研究工作，写有这方面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培养了军事思想专业的研究生，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在军内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理论等研究领域和翻译界享有较高知名度。